

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体性 建构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以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为中心

董 晨

【摘 要】 既往的梁建植研究忽视其中国文学研究的日本渊源，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未能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因循中韩（朝）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对“中国文学”概念、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以及近代意义上“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诞生的历史过程认识不清。基于此，本文以梁建植为线索，呈现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复杂、多面的中国观，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同时代朝鲜半岛文坛的位置及思想功能，以此管窥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诞生过程及其对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体性建构的意义。通过对梁建植的个例研究，本文试图为反思中韩（朝）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提供参考。

【关键词】 近代朝鲜半岛 梁建植 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观

【作者简介】 董晨，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09 - 0106 - 17

一、引言

在中韩（朝）文化交流史及朝鲜半岛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中，近代文人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活动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① 其中国文学研究

^① 参见董晨：《朝鲜半岛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梁建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为中心》，《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第160~169页。

与东亚汉文化圈共同的学术传统、朝鲜半岛的传统汉学并无继承关系，却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受西方汉学影响的中国文学研究渊源颇深。

梁建植（1889—1944），笔名白华、菊如、芦下生等，是以《石狮子像》（1915年）、《归去来》（1915年）等短篇小说在朝鲜半岛近代文学史中留名的小说家，也是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朝鲜半岛首屈一指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从古代白话小说及戏曲等俗文学^①研究开始。自1917年起，梁建植陆续发表了《关于小说〈西游记〉》《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破睡漫草——金云翘传》《〈红楼梦〉是非》等多篇文学评论，翻译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四弦秋》《牡丹亭还魂记》等多部小说、戏曲文本。其中，《西厢记》之外的其余戏曲作品均是第一次被译为朝鲜语。不仅如此，梁建植还是第一位将中国的文学革命及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现代文学作品介绍到朝鲜半岛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评论少有原创，主要取材于日本学界的相关著述。1921年之前，梁建植对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情况并不了解，与中国学者也没有过直接交流。他是通过日本，主要是《支那学》杂志才了解到中国的文学革命、现代文学作品以及胡适著述的出版信息等同时代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动态的。^②然而，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日本的

① 中国“俗文学”概念的确立始自郑振铎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郑振铎将俗文学作为区别于诗文等正统文学的概念使用。他提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中国“俗文学”的范围很广，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2页。本文使用中国“俗文学”概念，特指古代小说、戏曲两种文体，意在强调梁建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东亚汉文化圈共有的学术传统及朝鲜半岛传统汉学的特质。

②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为中心，用实证的方式具体呈现了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日本多部相关著述之间的影响关系。这是学界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日本渊源的首次较为全面呈现。其中，1917年梁建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初期，对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并不了解；他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史的综合性讨论以及对《红楼梦》《金云翘传》《桃花扇》《牡丹亭还魂记》《琵琶记》等作品的具体论述主要源自笹川临风、今关天彭、青木正儿等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他于1921年写给胡适的信中包含的所有关于胡适本人及中国文学革命情况的信息均来自日本《支那学》杂志等事实，均是首次被发现。以确凿的事实为基础，笔者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评论文少有原创，基本接近于一种翻译；二是，直至1921年，梁建植不是通过中国游学或留学，而是通过日本学界，主要是《支那学》杂志了解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状况，以及文学革命等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动态。目前，这两个结论已被韩国学界广泛接受。参见董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以中国俗文学研究为中心》，韩国西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中国文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被发现。对基本史实认识不清导致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未能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

就研究现状而言，相关史实已被发现，但是既往的梁建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真正的反思。那些问题表面上仅涉及梁建植这样一位近代朝鲜半岛文人，实质上却勾连着至今仍在干扰着中韩（朝）文化交流史研究深入展开的惯性思维。这也使得厘清问题之根源的工作成为必要。

日本学界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之影响明明有迹可循，为何在既往研究中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呢？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有个比喻：“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① 笔者认为，那些与梁建植相关的“鱼儿”之所以被遗漏在大海中，与中韩（朝）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以下三种惯性思维不无关系。第一，数千年来，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有着悠久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梁建植自然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第二，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都是直接发生的，无须第三国作为中介。梁建植自然直接受到中国影响，这是不证自明的事情。更何况，梁建植自述有中国游学经历，本人还曾写信给胡适表达钦佩之情。^② 第三，在近代朝鲜半岛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两种文化之间是“旧”与“新”、“传统”与“近代”的对立关系。“中国文学研究”自然属于“旧学”“传统”范畴，而日本是近代朝鲜半岛输入“西学”的基本通道，也就不会是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在这三种惯性思维的相互作用下，先行研究多着力发掘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活动的中国渊源。^③

① [英]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08 页。

② 1921 年梁建植写给胡适的信只能表明他读了日本《支那学》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和新刊介绍，无法证明他对中国学界动态有直接的认识和把握。参见董晨：《朝鲜半岛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梁建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为中心》，《文学遗产》2016 年第 6 期，第 168 页。

③ 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최용철, 「백화 양건식의 중국문학 연구와 번역에 대하여」, 『중국어문학』 제 28 권, 1996, pp. 573 ~ 602; 성현자, 「백화 양건식의 중국신문학운동 수용 연구」, 『비교문학』 제 24 권, 1999, pp. 298 ~ 327. 崔溶澈将梁建植成长为一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核心外因归结为梁氏于 1912 年之前有过几年的中国游学或留学经历。事实上，梁建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仍不会说中国话，长达数年的中国游学或留学说无法成立。成贤子将梁建植翻译的两篇日本学者的文章《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误以为是梁建植的原创。此外，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推论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受到了王国维影响。

那么，以上三种极为常见又看似合理的假设何以在对梁建植的研究中遭遇挫折呢？进一步讲，这三种惯性思维是否合理呢？本文从既往的梁建植研究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出发，以梁建植为线索，透视近代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建构中知识分子复杂、多面的中国观，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同时代朝鲜半岛文坛的历史位置及其在近代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建构中的思想功能。通过梁建植这一个例，本文试图为反思中韩（朝）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提供一点参考。

二、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朝鲜半岛的学术传统

1917年5月，梁建植在《朝鲜佛教丛报》第3号上发表《关于小说〈西游记〉》，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以中国文学为主题的文章，也是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的开端。朝鲜半岛数千年来与中国交流频繁，受中华文明影响极深。然而在梁建植所处的时代，像他这样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却极为罕见。

19世纪后半期，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西方列强划定的文明标准在东亚的影响渐强，东亚地区传统的政治秩序以及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文化秩序逐渐崩解。1894年甲午战争，更是摧毁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它扭曲了中日两国关系，终结了中朝宗藩关系，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历史拐点。^①甲午战争同样是朝鲜人的文明观与中国认识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节点。

甲午战争爆发同年，朝鲜王朝在亲日派官僚的主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史称“甲午更张”。“甲午更张”既显示了朝鲜王朝政治上脱离朝贡体制，文化上脱离中华文明，构建本国政治、文化主体性的意志，也包含着日本尽可能弱化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将后者纳入囊中的企图。此次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停用清朝年号，改用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废除科举制度，模仿日本近代教育体制设小学与中学；法律、公文不再使用汉文，以“国文”即朝鲜语为本，附以汉文或“国汉混用体”翻译等。甲午战争后，以下中国认识在朝鲜半岛逐渐成为主流：中国不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近代文明的落伍者。^②

在近代朝鲜半岛的中国观、文明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状况下，梁建植却以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主业，这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不

① 参见宋成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15页。

② 白永瑞将甲午战争后朝鲜人的中国观分为三种类型，并指出其中“贱视的中国”的认识类型在朝鲜半岛日据时期处于比较主流的位置。参见〔韩〕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6页。

合时宜，让一些研究者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梁建植与同时代热衷“西学”的知识分子的差异上，甚至将这种差异解释为延续传统与向往近代之差异。

本文仅举出其中两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韩国学界第一篇研究梁建植的论文《作为中国文学传信者的梁白华——以中国戏曲和小说为中心》，在数千年来朝鲜半岛上中国文学影响力的变迁史中定位梁建植。

自汉字传来以后直至李朝（李氏朝鲜）末期的“开化期”，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也正因如此，作为中国文学时代特征的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影响我国文学，可以说，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尤其是与其中的汉文学平行发展……然而，我国进入“开化期”之后，随着西洋文明日益东渐，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少。而且，随着西洋科学文明的输入，自然而然地对文学的关注也从东方转向西方。于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涌来，与之相反，中国的思想、文化则陷入退路。中国在朝鲜史上的影响位置被西方代替。在此过程中，我国被日本夺去国权之后，开始通过日本完成开化。于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急剧降低，只有梁启超、孙文、胡适、鲁迅等几个人的思想和文学被介绍、翻译过来。随之，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到了屈指可数的境地。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主要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被零星介绍过来。在当时，进行介绍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专攻者，知道汉文和日语的学者谁都可以。……在这些入之中，始终一贯地研究中国文学，并且以量而言，介绍、翻译作品最多的便是梁建植。^①

引文介绍了中国文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从古代至近代的显著变化。西学东渐后，朝鲜半岛上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迅速减弱，中国文学研究者数量急剧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者”均被作为自明、不变的概念使用。也就是说，朝鲜半岛上“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已有之，只是在梁建植所处的时代数量骤减。而梁建植的特殊性在于，在西方思想文化滔滔不绝地涌来、朝鲜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关注也从东方转向西方”之时，逆时代潮流而行，“始终一贯地研究中国文学”。那么，梁建植所坚守的是什么呢？文中虽未点明，但显而易见，是朝鲜半岛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

上述观点基本规定了其后多年间韩国学界看待中国文学研究者梁建植的基本视角。《白华梁建植研究——以“三一运动”以前的生涯为中心》一文被收录进《梁白华文集3》。这篇文章将梁氏生活穷困、日后在韩国文学史

① 이석호, 「중국문학 전신자로서의 양백화-특히 중국희곡과 소설을 중심으로」, 『연세논총』 제13집, 1976, pp. 117 ~ 118.

上被忽略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同时代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中国文学之关注。^①这显然也是把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放在了与“西学”相对的位置上。而事实上，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半岛，西方文学作品的朝鲜语译本同样销量惨淡，专业译者的生计同样不容乐观。^②翻译了易卜生、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作品的玄哲同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进入韩国文学史书写者的视野。然而，与忽视历史语境相比，上述判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加细究地把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中国文学”与作为梁建植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直接画上了等号。

上述两例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此类观点未能认识到，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学”概念的诞生为前提出现的。“中国文学”并非一个古老的、自明的概念。它的诞生，“是现代人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运用现代文学的标准，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分割、选择、重组的结果”。^③朝鲜半岛数千年来受中华文明影响极深。然而，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10年代的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却是不折不扣的新鲜事物。梁建植关注的中国文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桃花扇》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属于俗文学的范畴；另一类则是现代白话文学，如鲁迅、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人的作品。后者自不用说，前者也并不在朝鲜传统学问——汉学的范畴之中。

“在东亚地区，从汉代开始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中国为中心而逐步形成了一个汉文化圈。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东亚地区同文诸国的读书人有着类似的道德观念、知识结构和感受方式，形成了大同小异的文明。”^④在东亚汉文化圈，汉文即文言汉语是知识分子使用的书面语言，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雅文化则是他们共同的文化教养。近代以前，朝鲜半岛的主流学问是汉学。朝鲜半岛传统汉学以研习儒家经典为本，儒学者从中探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或言东亚汉文化圈知识阶层眼中的普遍文明。受中国影响，在近代以前朝鲜半岛的知识阶层看来，六朝志怪、唐传奇、宋代的讲谈、元曲以及明清白话小说等皆为鄙俗之物，无法像唐宋八大家的文

① 고재석, 「백화 양건식 문학연구 - 3.1 운동 이전까지의 생애를 중심으로」, 『양백화 문집3』, 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 1995, p. 373.

② 翻译了法国小说《世纪儿的忏悔》(1836年)、德国小说《猫路》(1889年)的朝鲜半岛近代作曲家、演奏家洪兰坡(本名洪永厚)1926年以后不再从事西方文学翻译。对此,金秉喆指出,最大的原因是朝鲜语译书卖不出去。参见김병철, 『한국근대번역문학사연구』, 을유문화사, 1975, p. 691.

③ 吴泽泉:《错位与困境: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报告》,《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89页。

④ 张伯伟:《东亚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变迁——以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为例》,《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页。

章和杜甫、陆游的律诗等文言诗文那样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

很显然，梁建植对中国俗文学及现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并不是对朝鲜半岛传统汉学的继承。对此，梁建植本人有充分的自觉。1916年，他得知春园李光洙的长篇小说《无情》即将出版的消息，随即发表《欢迎春园的小说》一文。文中，梁建植这样评价朝鲜半岛传统的小说观：

我们朝鲜自来受中国腐儒的恶劣影响，认为小说是文人末技。一般学人不屑提起，动辄就把刘勰“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作为唯一的金条玉律，认为小说对经典毫无益处，于是加以排斥。（小说）作者自身也在“劝善惩恶”的名头下自愧自卑，以小说仅是“故事书”的肤浅之见，认为读小说只不过是有助于下层社会和妇女们的消遣方法。^①

就像这样，梁建植批判朝鲜半岛视小说为文人末技，是以下层社会和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劝善惩恶”的“故事书”的传统学术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源于“中国腐儒的恶劣影响”。这显示了梁建植对中国儒学以及以儒学为本的朝鲜半岛传统汉学的基本态度。

在1917年11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一文中，对于自己为何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梁建植这样说道：

中国文学丰富且浩瀚如斯，而我这般书生辈就算做梦也无法窥其全豹。古来各专门大家多有相关研究，但是小说、戏曲方面的研究却至今无人着手，这委实奇怪。我相信作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小说、戏曲有作为文学的价值，因此有意大胆地做些研究。无奈本人只是个浅学驽钝且无能的书生，怎敢期待在研究上有所小成，只不过将此作为一个我感兴趣的消遣方法罢了。^②

面对朝鲜半岛上无人着手中国小说、戏曲研究的“奇怪”现实，梁建植称自己相信这项研究的价值，并有意大胆地做些研究。这表明，他明确认识到了这项研究在当时所具有的开创性以及挑战传统学术观念的性质。不过，梁建植把中国小说及戏曲研究作为“消遣方法”的说法只是谦辞罢了，并不足信。在文章末尾处，梁建植正式表明了他从事中国小说、戏曲研究的目的：“如有研究与朝鲜的习俗相对近似的、作为中国思想感情和想象反映的小说、戏曲等平民文学，与今日被部分青年文士引入的西洋文学相融合、调和为朝鲜文学做出贡献的人士，那就再好不过了。”^③

梁建植将中国文学、西洋文学、“朝鲜文学”三者并举，显示出了清晰

① 양건식, 「춘원의 소설을 환영하노라」, 『양백화 문집3』, 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 1995, p. 115.

② 양건식, 「支那의 小説及戲曲에 就하야 (一)」, 『每日申報』, 1917. 11. 6.

③ 양건식, 「支那의 小説及戲曲에 就하야 (四)」, 『每日申報』, 1917. 11. 9.

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此基础上，他所提倡的应加以研究的“中国文学”，是小说、戏曲等“平民文学”。更何况，梁建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为“朝鲜文学”作出贡献。这表明梁建植眼中的世界图景以及学术观念已从根本上区别于朝鲜半岛传统儒学者。

其次，前述先行研究未能理解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对中国认识的多面性、复杂性，于是做出了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排斥中国文学这一判断。事实上，作为“他者”的“中国”不仅投射了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想要变革的旧秩序，也是他们变革旧秩序、塑造“近代自我”时借鉴的对象。

近代朝鲜半岛构建民族主体性的过程，也是将中华文化相对化的过程。自19世纪末起，朝鲜思想界、文学界以革新为目的的各类发言均伴随着对华夷论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批判。朝鲜半岛自1894年到1910年的历史阶段，即韩国学界所说的“开化期”，引领风气之先的是申采浩、张志渊、朴殷植等自小接受传统汉学教育的革新派儒学者、启蒙思想家。他们立足于近代民族主义，尖锐批判华夷论，强调“朝鲜魂”，控诉汉文、儒教对朝鲜的恶劣影响。^①

及至20世纪10年代，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申采浩、朴殷植等人流亡中国。但是，他们对汉文、儒教、华夷论的批判态度却被安廓、李光洙等与梁建植同时代的新知识分子继承下来。安廓、李光洙也是最早一批讨论“朝鲜文学”概念的知识分子。他们二人均主张文学之于民族性传承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他们对“朝鲜文学”概念的讨论是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自觉进行的民族主体性建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廓、李光洙关于朝鲜半岛的“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朝鲜文学”的论述中，“汉文”“儒教”等源自中国的思想文化始终作为损害乃至灭绝朝鲜固有民族精神的反面主角在场。1915年7月，安廓在朝鲜留日学生杂志《学之光》上发表《朝鲜的文学》一文。文章强调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学”的影响，“对我国文学史影响最为重大之事便是中国的思想与汉文字的输入”。^②但是，这种影响在安廓看来极为负面，他将“朝鲜文学”的历史脉络概括为在汉文学影响下民族心性损毁的过程——“我朝鲜民族受汉文、儒教之影响而百弊俱出，最终有此惨状”。^③

1916年11月10日至23日，李光洙于《每日申报》连载发表《文学是

① 参见王元周：《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4页。

② 安廓，「朝鮮의 文學」，『學之光』 제 6 호，1915. 7，p. 69.

③ 安廓，「朝鮮의 文學」，『學之光』 제 6 호，1915. 7，p. 72.

什么》一文。他在文中主张，传承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最有力者便是此民族之文学，然而“朝鲜文学”却未能继承祖先所创造的“朝鲜民族特有的精神文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思想的传入。满心向往西方的李光洙把本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朝鲜文学”“脱去旧衣”“洗去旧垢”，沐浴“西洋新文化”。^①以此认识为前提，他将“朝鲜文学”界定为用朝鲜语写作的文学，把朝鲜汉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据此标准，李光洙断言：“自高丽朝到李朝世宗，无有能被称为‘朝鲜文学’者。”^②

然而，近代朝鲜半岛思想界、学术界的革新者并非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们普遍将矛头对准的，是汉文、儒教、华夷论等与朝鲜半岛乃至东亚汉文化圈旧的文化秩序、政治秩序息息相关的部分。正因如此，愈是激烈的批判者，对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针对旧秩序的变革运动，愈是能产生共鸣。他们不但热切关注，还将其作为他山之石，积极传播其思想。

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尤其是梁启超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研究显示，1905年前后朝鲜半岛的“爱国启蒙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对其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就是梁启超。1898年创刊的《皇城新闻》以儒学者阶层作为主要受众，自创办伊始就大力批判中国中心的历史观。然而，这家报纸在1906年、1907年连载的外国史传类文章中，除《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之外，其余均为梁启超的著述或译作。^③申采浩、朴殷植等人激烈批判华夷论，与此同时，也是他们积极接受并大力传播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新小说”。他们不仅译介梁启超以不避俗字俗语的新文体创作的、旨在开启民智的“新小说”，还投身于朝鲜“国文”启蒙小说的创作中。

梁建植所关注的中国文学，显然不在同时代的新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中国文学之列。恰恰相反，在梁建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自觉地舍弃朝鲜半岛传统汉学中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中国文言诗文，积极从事中国俗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其本身就构成了对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秩序之挑战。

理清了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朝鲜半岛的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同时代的朝鲜半岛文坛，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处于什么位置，它与“李光洙们”所向往的西方文明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① 参见李光洙，「文學 이란 何오」，崔珠澣，波田野節子 편，『이광수 초기문장집2 (1916—1919)』，소나무，2015，p. 114。

② 李光洙，「文學 이란 何오」，崔珠澣，波田野節子 편，『이광수 초기문장집2 (1916—1919)』，소나무，2015，p. 122。

③ 关于梁启超在近代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参见최기영，『『皇城新聞』의 역사관련기사에 대한 검토』，『한국근대계몽운동연구』，일조각，1997，pp. 2 ~ 11。

三、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西学”

论及梁建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时朝鲜半岛文坛的思想概貌，前述两篇先行研究，即《作为中国文学传信者的梁白华——以中国戏曲和小说为中心》和《白华梁建植研究——以“三一运动”以前的生涯为中心》，仅强调向往西方文明的新知识分子之活跃，却忽略了直至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传统汉学者在朝鲜半岛文坛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①而后一点对于定位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文坛的位置而言极为关键。

以“甲午更张”为节点，汉文作为朝鲜半岛书面语言、主流文学语言的地位遭遇了来自“国文”的强力挑战。然而，“国文”登场后未能在短时间内全面替代汉文，以“国文”写作的新知识分子也并未迅速取代儒学者在朝鲜半岛文坛的地位。这是因为，在“甲午更张”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构成朝鲜半岛知识阶层主流的还是自幼接受汉文教育的群体。这一群体中的传统儒学者自不用说，其中的革新派即便在理念上排斥汉文，但在知识感觉上仍然对汉文怀有亲切感。有研究显示，申采浩、朴殷植等人表达个人感怀仍习惯于借助汉诗，甚至他们都是朝鲜半岛“开化期”报纸、杂志“词藻栏”内频频出现的汉诗作者。^②及至20世纪10年代，朝鲜总督府依靠宪兵与警察实施“武断统治”，进行强力的思想管控，“开化期”风靡一时的“国文”政治小说迅速退潮。加之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积极拉拢朝鲜儒学者，朝鲜汉文学因此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期。^③

朝鲜半岛殖民地时代初期，儒学者与汉文学依然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这也是梁建植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之初面对的一大困扰。20世纪10年代，以俗文学研究开启中国文学研究之路的梁建植所承受的压力，与其说主要来自当时朝鲜人轻视中国的社会风气，不如说源于朝鲜半岛的传统学术观念。梁建植曾提到：“我自小便有喜读小说的嗜好，多少读了些劣作、杰作、新旧小说，也因此听了许多挚友的嘲笑与父兄的斥责。”^④如前所述，梁建植于1916年写文章支持李光洙的长篇小说《无情》，公开表示对朝鲜半岛贱视小说的

①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日本留学派知识分子才取代汉学者掌握了朝鲜中央文坛的主导权，汉诗也开始走向衰退。参见주승택, 『한문학과 근대문학』, 태학사, 2009, p. 93.

② 参见주승택, 『한문학과 근대문학』, 태학사, 2009, p. 88.

③ 参见 권보드래, 「1910 년대의 이중어 상황과 문학 언어」, 『동악어문학』 제 54 집, 2010, pp. 14 ~ 18.

④ 양건식, 「춘원의 소설을 환영하노라」, 『양백화 문집 3』, 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 1995, p. 115.

传统学术观念之不满，这何尝不是他对当时汉学者当道、汉文学复兴，从事以白话写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仍不被视为正途的时代氛围之回应呢？

事实上，梁建植的学术志趣并未让他与那些向往“文明”“开化”的新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他的中国文学评论和翻译多发表于《每日申报》《东亚日报》等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以及《开辟》《东明》《新天地》《三千里》《朝鲜文坛》等较为知名的刊物上。从人际关系来看，梁建植与崔南善、李光洙等启蒙主义文学家有直接交往，与崔南善在朝鲜光文会结识后一度每日见面，^① 被李光洙称为“朝鲜唯一的中华剧研究者、翻译家”，^② 与比他小八岁的小说家廉想涉是至交好友。20世纪20年代中期，梁建植与廉想涉、玄镇健、金亿等知名作家一道参与《朝鲜文坛》杂志每月一次的文学作品评论会。1934年，他又与朴英熙、朱耀翰、金东仁等当时朝鲜半岛文坛的中坚力量参加杂志《三千里》举办的“文学问题评论会”。^③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是西方汉学影响下的产物，本质上也是一种“西学”。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地区的传统汉学不同，西方汉学把中国文化作为外国文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近代学术分科体系下展开研究。东亚传统汉学与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取向也有显著差异。对此，日本学者盐谷温曾谈道：“我国的先儒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以古典为主，只进行诗、文研究。相反，西方汉学家从语言学着手，有更重视通俗文学的倾向。”^④

在东亚地区，受西方汉学影响，最早进行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国家是日本。19世纪末，日本学界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已初步兴起。从幸田露伴、森鸥外、森槐南、今关天彭等自幼接受过汉学教育的作家、汉学家，到笹川临风、久保得二、盐谷温等毕业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机关帝国大学的学者均有相关著述。其后，由狩野直喜等人开创的京都中国学派更是以中国戏曲研究闻名。

据笔者研究，梁建植虽然被李光洙称为朝鲜半岛“唯一的中华剧研究者”，但他的中国俗文学评论文内容主要取材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著述，他本人并不具备独立从事相关研究的能力。^⑤ 给梁建植的中国

① 参见양건식, 「내가 본 崔南善씨」, 『양백화문집3』, 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 1995, pp. 144 ~ 145.

② 이광수, 「梁建植君」, 『개벽』 제44호, 1924. 2.

③ 参见박영희, 주요한, 양건식 등, 「문학문제평론회」, 『삼천리』 제6권 제7호, 1934. 6.

④ [日] 塩谷温: 《支那文学概論(上篇)》, 弘道館1946年版, “自序”, 第2页。

⑤ 详细考证见董晨: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以中国俗文学研究为中心》, 韩国西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年, 第16~66页。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与日本学界相关著述的具体影响关系可参见董晨: 《朝鲜半岛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梁建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为中心》, 《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第167页。

文学研究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日本学者，有写作了《中国文学史》（1898年）、《中国小说戏曲小史》（1897年）的笹川临风，《中国文学概论讲话》（1924年）的作者盐谷温，向日本学界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元曲研究大家青木正儿等，他们都是日本各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具备以西方的近代文学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以西方文学史写作体例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能力。梁建植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为中心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除与其自幼就有的阅读兴趣有关之外，也与他接触到了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20世纪20年代，梁建植也关注了由青木正儿、小島佑馬、本田成之等京都中国学派的学人创办的《支那学》杂志。不过，从梁建植的文章内容上看，在《支那学》上刊载的相对艰深的戏曲研究论文与依照西方文学史体例写作的浅显易懂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中国文学大纲卷之三·李笠翁》（1897年）、《中国文学大纲卷之五·汤临川》（1898年）等文学史著述之间，梁建植选择取材的是后者。

梁建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能力有限，但他的上述选择依然体现了他对西方近代文学观及文学研究方法的认同。这种认同与梁建植对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观及文学批评方法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笹川临风在《中国文学大纲卷之五·汤临川》一书第二章“中国戏曲的性质”中称，在儒教德义的束缚下，“劝善惩恶、启蒙教导是中国戏曲的第一义”。受此影响，中国戏曲难见悲剧而多喜剧。^①在举例论证后，笹川临风从悲剧美学的角度评价中国戏曲稚气犹存。^②在《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一文中，梁建植完全接受了笹川临风对中国戏曲性质的上述论断，只不过，他将这种论断扩展至中国小说、戏曲整体。梁建植指出，元、明、清的小说、戏曲虽然结构宏大，写情“婉丽优雅”，叙事“精密周到”，却几乎没有悲剧。紧接着，他便感叹：“无怪乎斯学的专家评价中国小说及戏曲尚且幼稚啊。”^③在此基础上，梁建植对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观以及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方法做出了如下评价：

原本在中国，小说、戏曲被当作文人的末技，未曾引发特别的关注。即使热衷于披览者也并非将其作为文学上的小说来读，而是由于喜爱作者锦心绣肠中吐露的绚烂的文章词华。作者自身也不懂美学，不解小说的真义，诸多作者不出劝善惩恶的范畴，不知实际上艺术拥有超越

① 参见〔日〕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大綱卷之五·湯臨川》，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898年版，第48~50页。

② 参见〔日〕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大綱卷之五·湯臨川》，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898年版，第70页。

③ 양건식, 「支那의 小説及戲曲에 就하야(四)」, 『每日申報』, 1917. 11. 9.

道德的自由。一流的评论家金圣叹批评的论调也不是小说、戏曲上的批评，只不过是文章上的评论罢了。^①

不难发现，梁建植对“美学”的强调，以及认为“艺术拥有超越道德的自由”的理念明显源自西方近代的文学观。而他对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不是小说、戏曲上的批评”的认识，则显然是依据西方近代文学研究理念做出的判断。就像这样，梁建植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上突破传统、积极接受经日本中转到达朝鲜的“西学”。

四、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体性建构

当西方逐渐取代中国成为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眼中新的“中华”，当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养分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只不过，对“中国文学”这一流动的、历史的概念之固化认识，对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中国观的单一想象，扭曲了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本来面目的认识，也遮盖了他的选择与同时代新知识分子的选择本质上的一致性。

与上述问题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当时朝鲜半岛文坛的位置及其承担的思想功能。朝鲜半岛被日本强行吞并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急剧减少。然而，纵观整个殖民地时期，在朝鲜“国学”“国文学”范畴形成的过程之中，“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始终作为另一个主角而存在。韩国文学评论家崔元植指出，“殖民地时代的国文学研究是从国学派开始的。以安廓、申采浩、郑寅普、文一平等为代表的国学家们，继承了朝鲜后期实学派的学风，通过否定华夷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开拓出一条国学之路”。^② 表面看来，甲午战争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渐弱，但是，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开化期”还是殖民地时期，即便当时朝鲜社会对于中国的主流态度转向了否定与贱视，但在思考朝鲜半岛自身问题、构筑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是绕不开的思想资源。

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朝鲜半岛文坛对于“朝鲜文学”概念的讨论尚处于起步状态。关于朝鲜汉文学是属于“朝鲜文学”还是应被归类为“中国文学”的问题，在当时仍活跃在文坛的传统儒学者与李光洙等新知识分子之间有着巨大的认识差异。如前所述，一方面，汉文学处于复兴期；另一方

① 양건식, 「支那의 小説及戲曲에 就하야(四)」, 『每日申報』, 1917. 11. 9.

② [韩] 崔元植:《国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论》,《文学的回归》,崔一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面，安廓、李光洙等有过日本留学经验的新知识分子则试图将汉文学排除在他们正着力建设的作为“民族文学”的“朝鲜文学”范畴之外。这也显示，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文学”概念与“中国文学”范畴尚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未能形成各自清晰的轮廓。恰恰在此时，梁建植自觉地接受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及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为基础的西方汉学之理念，积极吸收日本的相关研究经验，开启了自身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此，梁建植构建了一个明确区别于朝鲜半岛传统汉学，甚至对其以儒学为本的学术理念以及华夷论的世界观形成反抗的“中国文学研究”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量吸收了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给予他重要影响的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却存在着重要差异。笹川临风、今关天彭、盐谷温等人肯定中国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也同样尊重进入日本汉学范畴中的中国文言诗、文。他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戏曲两种体裁。今关天彭本人就是日本知名的汉学家、汉诗人。笹川临风在小说、戏曲专论之外，还著有《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大纲》（共十六卷）中的《元遗山》（1898年）、《杜甫》（1899年）、《曹子建》（1900年）、《孟子》（1900年）卷。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也涵盖了多种文学体裁。与他们不同，梁建植刻意将朝鲜半岛传统汉学重视的中国文言诗、文等文学体裁排除在了自身研究的“中国文学”之外。

反抗传统、建设新的朝鲜文学，也是梁建植20世纪20年代初向朝鲜读者介绍中国文学革命与现代文学作品的根本指向。事实上，翻译青木正儿的文章本身就是梁建植积极选择的结果。中国文学革命爆发之初，海外影响力相当有限。从整体上看，当时日本学界对其反应比较冷淡。今关天彭是给梁建植的《红楼梦》研究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日本学者。他于1918年到1931年间在中国生活，在三井合名本社的支援下设立研究中国问题的今关天彭研究室。^①1931年，今关天彭出版《近代中国的学艺》^②一书，介绍中国清代及现代学术界的状况，书中论及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时，仅列举文言诗、词、文，对于现代白话作品不曾提及。青木正儿是日本学界第一位正面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学者。自1920年起，青木正儿陆续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的文学革命及胡适、吴虞等学者的文章。然而，青木正儿日后回忆，当时日本几乎无人关注中国文学革命及现代文学，自己倍感孤独，犹如在旷野中独行。^③而他本人其后专注于中国戏曲研究，没有再对

① 参见〔日〕今関天彭、小野忍、山口一郎等：《学問の思い出－今関天彭先生を囲んで》，《東方学》1967年总第33辑，第158页。

② 〔日〕今関天彭：《近代支那の学芸》，民友社1931年版。

③ 参见〔日〕青木正児：《江南春》，平凡社1972年版，第63页。

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积极关注。但青木正儿不曾想到，他的文章在朝鲜半岛遇到了知音。读到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漩涡中心的文学革命》^①《吴虞的儒教破坏论》^②后，梁建植深受中国文学革命的鼓舞，随即将青木正儿的文章翻译后发表在《开辟》杂志上。他也成为第一位正式将中国的文学革命介绍到朝鲜半岛的人。

青木正儿的文章和《支那学》杂志是梁建植开始积极关注同时代中国学界动态的重要契机。在介绍中国文学革命之前，梁建植发表的《关于小说〈西游记〉》《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关于〈红楼梦〉》等三篇评论文的核心内容均源自《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戏曲小史》等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述。那时的他对同时代中国学界的情况还非常陌生。1917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史》等多部研究著述已经问世，梁建植却还在感叹，与中国小说、戏曲研究相关的参考书只有李渔的一篇戏曲论。^③

通过《支那学》杂志了解到中国的文学革命后，梁建植开始寻求与中国学者的直接交流，并开始译介中国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文学革命的相关文章以及现代文学作品。1921年1月，梁建植向胡适写信表达敬仰之情。^④自1922年起，梁建植开始翻译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沈尹默、康白情、吴芳吉、田汉、熊佛西等人创作的现代文学作品。经他之手译介到朝鲜半岛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新诗10首、小说18篇、戏剧15篇。^⑤

梁建植与给予他重要影响的日本学者的上述区别，并不能仅仅被视为个人研究兴趣之差异。这种区别反映的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发展与在日本发展之不同步。20世纪10年代的日本，包括俗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专门的学术领域。然而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上，“中华剧研究者”梁建植只是个孤家寡人。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衰微，也对应着朝鲜“国文学研究”中古代小说研究的状况。整个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朝鲜古代小说研究者还不到十人。^⑥

不仅中国俗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呈现出了与在日本极为不同的状态，中国的文学革命与现代文学在朝鲜半岛也引发了与在日本大相径庭的反应。青木

① [日] 青木正儿：《胡适を中心に渦いてある文学革命》，《支那学》1920年第1卷第1～3号。

② [日] 迷陽山人：《吴虞の儒教破坏论》，《支那学》1921年第2卷第3号。（青木正儿的笔名为迷阳山人——笔者注）

③ 参见양건식, 「支那의 小説及戲曲에 就하야(四)」, 『每日申報』, 1917. 11. 9.

④ 这封信件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601～605页。

⑤ 参见「작품 연표」, 『양백화문집3』, 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 1995, pp. 495～502.

⑥ 参见박성희, 『한국문학연구사』, 예그린출판사, 1978, p. 23.

正儿对中国文学革命的正面评价在同时代日本知识界应者寥寥，因青木正儿的文章而深受文学革命鼓舞的梁建植在朝鲜半岛却有诸多同道中人。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朝鲜半岛长期大量报道、译介相关情况，“如整理国故、新诗创作、白话文、大众语、国语统一及汉字改革、东西文化论战、非宗教运动、国民文学与普罗文学等”^①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均被介绍到朝鲜半岛。20世纪30年代，当《朝鲜汉文学史》《朝鲜小说史》的作者金台俊^②主张新的“朝鲜文学”不应将汉文学纳入其中之时，就以中国现代文学为镜鉴。^③ 而此时，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学界仍然不受重视。1933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系的34名毕业生之中，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毕业论文主题的仅竹内好一人。^④ 这似乎也说明了，与朝鲜半岛知识分子以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新思潮为“他山之石”的情况不同，那个时代以中国的文学革命和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问题的日本知识分子很罕见。

那么，如何理解20世纪10—30年代，朝鲜半岛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现出的与日本不同的特质呢？这种差异显然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西方化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密切相关。问题在于，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能否被解释为民族性或历史过程等方面的优劣关系？

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提醒我们，“有必要反省以‘先进’与‘后进’的认识框架看待到目前为止的近代化过程；它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⑤ 他进而提出，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所显现的时间上的先后之差实际上反映了二者近代化过程的类型之别。^⑥ 沿着沟口雄三的思考，我们是否也能主张，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呈现出的与日本不同的特

①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② 金台俊（1905—1950），1931年毕业于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文科，著有《朝鲜汉文学史》（1931年）、《朝鲜小说史》（1933年）、《增补朝鲜小说史》（1939年）等。1944年到延安。朝鲜半岛解放后，曾担任朝鲜共产党文教部长。

③ “最令人悲哀的是，现在朝鲜的汉文学者一谈汉文学，文章必称先秦两汉、唐宋八家，律诗必举鲍谢杜陆，于此止步。实际上这是虚言妄发。反映现代中国民族精神之发展跃动的文学，是中国现代口语即白话文学，古代文言体诗文已成为供人观赏的古董。我现在以此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即是兴盛一时的古典研究的终结。学习文言汉文、作汉文文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这项工作意味着对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这是汉文学史的使命，特别是朝鲜汉文学史的使命）。”见〔韩〕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张琏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④ 参见〈다케우치 요시미 연보〉, 다케우치 요시미 지음, 『일본과 아시아』, 서광덕·백지운 옮김, 소명출판, 2004, p. 466.

⑤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序论”，第20页。

⑥ 参见〔日〕沟口雄三：《两种近代化道路——日本与中国》，《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7~125页。

性，不是起因于朝鲜半岛的近代化相对于日本的“后进性”，而是根源于二者近代化过程的类型之别呢？

沟口雄三还指出，无论在明治以前还是之后，日本人常常以中国为媒介来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①事实上，这一点在朝鲜半岛也不例外。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例如在本文重点讨论的20世纪10年代，作为媒介的中国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建构本民族主体性时所承担的具体功能却不一定相同。

五、结语

重返梁建植研究，本文试图提供一种思路，即由梁建植个人所折射出的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诞生与发展的特有过程，与作为“他者”的“中国”在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建构中承担的具体功能息息相关。朝鲜半岛脱离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后，迅速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政治上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希望已经破灭。在此情况下，梁建植和朝鲜新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于新的民族文化建设之上。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随之承担起“除旧迎新”的思想功能。事实上，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梁建植，以及包括他在内对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共鸣的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都将他们对作为民族文学的“朝鲜文学”的期待投射到了他们的研究或关注对象之上。而梁建植自身是以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式，参与了近代朝鲜半岛新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民族文学乃至民族主体性之建构。

从结果上看，“梁建植们”的努力未能达到他们所期待的效果。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仅仅通过殖民当局许可下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化”建设，如何能够打造出真正的民族主体性呢？然而，在客观原因之外，不得不说“梁建植们”的失败也源于他们对朝鲜半岛传统汉学乃至东亚汉文化圈共同学术传统之刻意忽略乃至简单否定。毕竟，民族主体性的建构不能不扎根于自身的历史土壤，也不能仅仅依靠对西方文明的模仿和跟从。然而，笔者无法因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缺乏原创性，最终未能对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体性建构起到实质性作用而以后来者的姿态对其加以批评。当笔者一度要这样做的时候，想到了韩国文学批评家崔元植反思自身文学研究三十年的历程时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我在那种艰难的时代，遭遇那种困境，我会怎样行动？”^②

（责任编辑：陈华积）

①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序论”，第9页。

② 〔韩〕崔元植：《我的国文学研究30年》，《文学的回归》，崔一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59页。